

“三部大全”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韩]朴性日（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摘要：中国明朝和朝鲜王朝开国初期的官学皆是随着程朱学而发展的。1392 年朝鲜开国不久，与明朝建立事大外交关系。1402 年明成祖即位后，明朝开始馈赠理学典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1419 年明成祖初次馈赠的“三部大全”。“三部大全”是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学者奉明成祖敕命编撰的儒家经典合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的合称。“三部大全”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很快成为朝廷内经筵的重要书籍。与此不久，朝鲜朝廷积极印刷刊行“三部大全”抄本。1446 年朝鲜世宗发明韩文，为了普及理学典籍，朝鲜理学家又针对“三部大全”做谚解工作。

关键词 明朝；朝鲜；理学典籍；三部大全；谚解

一、“三部大全”传入前的程朱学的传播

朝鲜半岛的性理学在元干涉期（1259-1356）的高丽儒家思想基础上发展来。据15世纪《高丽史》记载，“以太尉留燕邸，构万卷堂，书史自娱。召齐贤至都，时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等，咸游王门，齐贤相从，学益进，燧等称叹不置。”^①李齐贤（1287-1367）入元朝期间跟随已退位的高丽忠宣王（1298-1313）与姚燧（1238-1313）、阎复（1236-1312）、元明善（1269-1322）、赵孟頫（1254-1322）等元儒之间有过交流。值得一提的是，据元代理学学脉关系，姚燧（1238-1313）是许衡（1209-1281）的门生，元明善（1269-1322）、虞集（1272-1348）则皆是吴澄（1249-1333）的门生，赵孟頫（1254-1322）是继承吴澄理学的人物。朝鲜学者李选（1632-1692）在他的《芝湖集》中提及李齐贤之师，白颐正（1247-1323）求朱子学典籍的经历：“留燕都凡十年。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公在元得以学之，多求程朱性理书以归。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而菊斋权薄，又镂板四书集注，以广其传。东方学者之知尊程朱，公之力也。”^②据李选的表述，白颐正在元滞留时期，恰逢中国开始推广程朱学，然而此时程朱学尚未传入朝鲜半岛。白颐正系统引进程朱学回高丽之后，李齐贤和朴忠佐（1287-1349）等人拜他为师，权薄（1262-1346）做了《四书集注》的雕版工作。与他们同时期的李穡（1328-1396）在他文集《牧隐集》中论及当时中国的经术情况：“宋社既屋，其说北流，鲁斋许先生，用其学相世祖，中统至元之治，胥此焉出。呜呼盛哉！”^③该评价与元朝文学家揭傒斯（1274-1344）

① 《高丽史·卷一百一十·列传卷第二十三》。

② 【朝鲜】李选：《芝湖集·卷五·彝斋白公实》。其相关记载早见于《高丽史·卷一百六·列传卷第二十三》：“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

③ 【高丽】李穡：《牧隐文稿·卷九·选粹集序》，原文参见文集编撰委员会编：《国语稼亭集牧隐集》，大田：农经出版社，1983 年，第 528-531 页。深受李穡学术的朝鲜王朝，在实录中也出现该评价。《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

在《文正吴公神道碑》一文中“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颇为相似。

①李穡在文中没有提及吴澄，但他高评价许衡的学术深刻影响元世祖（1260-1294）的统治。在元朝大都滞留期间接受程朱理学的高丽学者们，回高丽后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培养出一大批新时代的士大夫，后来称其为“新进士大夫”。新进士大夫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建立新王朝的激进派士大夫，另一派是支持内部改革而反对新王朝建立的稳健派士大夫。两派士大夫曾在同一个门下学习新儒学，如李穡门下有反对推翻王朝、被后世称为“东方理学祖宗”的郑梦周（1337-1392），也有支持新王朝建立的朝鲜开国宰相郑道传（1342-1398）。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前形成了两个性理学政治理念。激进派士大夫主导新王朝前中期思想，后来经过几次冲突，继承稳健派的士大夫主导朝鲜后期到晚期思想。某种意义上，朝鲜前期激进派和稳健派在程朱理学观念上的冲突促使朝鲜半岛内的儒家思想更加本土化。回到朝鲜开国期性理学问题，郑道传在《陶隐文集序》中梳理了思想谱系：吾东方虽在海外，世慕华风，文学之儒前后相望……近世大儒有若鸡林益斋李公，始以古文之学倡焉。韩山稼亭李公、京山樵隐李公从而和之。今牧隐李先生蚤承家庭之训，北学中原，得师友渊源之正，穷性命道德之说。既东迁，延引诸生……②。李齐贤（号“益斋”）提倡古文，李穀（1298-1351）和李仁复（1308-1374）就跟随他。之后李穀之子，李穡（号“牧隐”）在元朝学习儒学，回国之后培养出新一代儒学家。根据上文所列的理学家名单来看，他肯定了朝鲜前期性理学所受元朝儒家学派的影响。正如前文所提，他是新王朝开国前激进派和稳健派儒生之师。也就是说，朝鲜理学本身就是李穡学术的延伸。他的理学思想又成为之后朝鲜王朝理学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不提的重要因素。李穡作为开国初朝鲜王朝理学之父，他的儒术基本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深受元儒许衡的“气”论影响；二是受其师李齐贤重视修养和实践思想的引导；三是尊崇其父李穀“儒释道三教融合”之思想。③

李穡门下徒弟之间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就在此背景之下形成，也奠定了之后朝鲜儒学思潮史的基本形态。激进派士大夫推崇作为革命机器的“性理学”，而稳健派重视作为个人修养的“道学”。一度发展到“词章”和“道学”观念问题，又影响到“官学”和“私学”之间的争论。郑道传在《佛氏杂辩》一文中论及他对“心统情性”之义的理解，道：

心者。人所得于天以生之气。虚灵不昧。以主于一身者也。性者。人所得于天以生

录·卷四十二》（明正德 16 年，朝鲜中宗 16 年壬子第一纪事，1521 年）：“领事南袞曰：‘许衡，一时大儒。当世祖立国之日，中统、至元之治，皆衡之功也。’”

①【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补遗·文》，原文参见《揭傒斯全集》，李梦生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538 页。

②【朝鲜】郑道传：《三峰集·卷三·序》，原文参见《국역삼봉집》（一册），서울:민족문화추진회，1989 年，第243页。

③李甦平：《韩国儒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之理。纯粹至善。以具于一心者也。盖心有知有为。性无知无为。故曰。心能尽性。性不能知检其心。又曰。心统性情。又曰。心者。神明之舍。性则其所具之理。观此。心性之辨可知矣。”在《心气理篇》则道：“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四时于是而流行。万物于是而化生。人于其间。全得天地之理。亦全得天地之气。”^①

根据该表述，不难发现其程朱理学立场。文中已能看出逐渐吸收程朱理学“心与性”“性与理”等概念的儒学形态。上面的表述近似于《朱子语类》中朱熹对张载（1020-1077）“心统性情”的解释，即“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②《许文公语录》中，许衡解释“心统性情”之义道：“天即理也。有则一时有，本无先后。心，统性情者也。性者，心之体。情者，心之用也。”^③整体来看，郑道传充分吸收朱熹和许衡的“心统性情”说。正因如此，他们所谓的“道统观”被习惯性地看作为“文道论”。因此，在“贯道”或“载道”问题上颇有争议。郑道传在《陶隐文集序》一文中提出对当时需要的儒家文风的构想：“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诗书礼乐，人之文也。然天以气地以形，而人则以道。故曰文者载道之器。言人文也得其道，诗书礼乐之教明于天下，顺三光之行，理万物之宜，文之盛至此极矣……皇明受命，帝有天下，修德偃武，文轨毕同。其制礼作乐，化成人文以经纬天地。”^④

在宋濂《华川书舍记》一文中可看出与上文相似的表述，其文道：“日月照耀，风霆流行，云霞卷舒，变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岳列峙，江河流布，草木发越，神妙莫测者，地之文也。群圣人与天地参，以天地之文发为人文。”^⑤若只看上面原文，其基本内容近似于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琦，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⑥等内容从时代的背景考虑，固然能看出作者的写作主旨，即“以宋儒术为基”。可是关于“载道”的讨论，宋代以前也常出现。作者想要阐明的并非是作为理想的新王朝文化，也不是对心性的见解，而是想要切合当时新王朝面临的现实需求，即“文轨毕同”，引进当时统治中原的明朝儒学文化。原文中的“其制礼作乐”是表明当时朝鲜王朝开国时期的儒学家们已明确引进明代

① 同书·卷六·心气理篇，原文参见《국역삼봉집》（一册），第364页。

②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原文参见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8页。

③ 【元】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二·语录下》，原文参见《许衡集》（上），许红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3页。

④ 【朝鲜】郑道传：《三峰集·卷三·序》，原文参见《국역삼봉집》（一册），서울:민족문화추진회，1989年，第242、244页。

⑤ 【明】宋濂：《宋濂全集·潜溪前集卷之五》，原文参见《宋濂全集》（一册），罗月霞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⑥ 【南朝梁】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儒学体制的必要性。在郑道传看来，为了凸显原文前一段里的“人文也得其道”，朝鲜就应该模仿明朝儒术。值得一提的是，“文轨毕同”最终成为朝鲜王朝儒学家群对明代儒家文化接受之后的理想状态。

经过前面对朝鲜王朝建国前后如何认知理学并发展问题的讨论，可知朝鲜学者们基于理学，奠定了开国初期的文化，中国明朝和朝鲜王朝两个王朝皆于14世纪开国，而主导建立新王朝的功臣群都主张以儒学治国为本。从某种意义上，与中国明朝之间建立事大外交关系的朝鲜也是据此而形成的。朝鲜学者朴泰茂(1677-1756)在《策问》一文中简述明代初期理学谱系：明朝理学。有真伪之别。后学之所当明辨者也。宋景濂为白云许氏门第，则其于朱子法门，不无渊源。而徒有文词，未见实践。此何故欤？自兹以后，称理学家。^①朴泰茂认为明代初期理学开创者乃为尊崇朱子理学的宋景濂。原文中的“文词”一词的含义是“非经典之意”。也就是说，宋濂作为明代理学门徒的典范，“载道和贯道”之文外的其他文类都被视为枝叶。朝鲜学者李裕元(1814-1888)在《金正希聲》一文中揭示理学谱系：圣人吾不得以见。吾于六经，以求圣人之心矣。吾道盛于宋朝，两程氏朱夫子出。至皇朝，宋景濂得其华，方正学得其大。^②李裕元认为理学在宋代盛行，到明代宋濂和方孝孺之后，理学越来越发达。在该文中肯定了宋濂和方孝孺在明理学上的位置。根据朝鲜后期学者对明前期理学的论述，何以证明朝鲜前期儒学家深受明代前期理学之影响？这个问题的线索毫无疑问是在“三部大全”的传入。

二、“三部大全”的传入

朝鲜学者申翊圣(1588-1644)在《书金伯厚〈朝京日录后〉》一文中写道：“本朝以洪武壬申受封，而永乐以后，始锡倚章、书籍、庆吊之节、视同内服。盖献庙朝天，历谒燕邸，圣神遵会，契合昭融，改玉之后，恩造弥隆，数百年间，蔚有同文之美。”^③正如文中提及，朝鲜受明太祖册封后明朝皇室再未馈赠理学书籍，直到明成祖即位前才恢复，朝鲜这才可以全面吸收明朝理学。1402年，燕王朱棣即位成为明成祖之后多次馈赠理学书籍，如《大学衍义》《春秋会通》《朱子全书》《烈女传》《礼部仪注》《通鉴纲目》等理学书籍。^④由此可发现，《朝鲜王朝实录》中出现明皇帝馈赠理学典籍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永乐年间。除了明皇帝馈赠的理学典籍之外，亦有朝鲜文人奉王命在出使明

①【朝鲜】朴泰茂：《西溪集·卷七》，原文参见《国语西溪先生集》（四册），부산：도서출판 가람，2008年，第407-408页。

②【朝鲜】李裕元：《林下笔记·卷七·近悦篇》，同卷《潘南山府》：“古者，文以载道也。宋景濂得其华，方正学得其大。”

③【朝鲜】申翊圣著：《乐全堂集·卷八》，原文参见《乐全堂集》（二册），서울：학자원，2016年，第509页。“献庙”指朝鲜太宗庙号。

④《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卷十二》（明永乐4年，朝鲜太宗6年12月22日丁未第一纪事，1406年）：“帖木儿宣敕，赐王《通鉴纲目》、《汉准》、《四书衍义》、《大学衍义》各一部。”同实录·卷十六（明永乐6年，朝鲜太宗8年9月24日己巳第一纪事，1408年）：“朝廷使臣礼部郎中林观以赍来《礼部仪注》，授礼官：礼部为礼仪事，今于礼制内，抄录合行仪注，与钦差使臣赍执前去，遵守施行。赐《祭仪注》、《聘仪注》、《谥仪注》。”

朝时沿途购买理学相关书籍。明朝官方刊印的理学典籍传入朝鲜半岛，足以影响朝鲜文人将其作为官方学问的理学。

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半岛历代理学家文集里面曾常出现“性理”一词，早在出现高丽末朝鲜初期学者李穀《稼亭集》里“性理之文”、李穡《牧隐文稿》里“性理书”等。到朝鲜开国之后编纂的文集里面，频繁出现“性理之学”一词，如在郑道传《三峯集》和权鏊《海东杂录》里都有“性理之学”。朝鲜理学家用“性理”远远多于“程朱学”，而这特征一直延续到朝鲜王朝灭亡。主导建立新王朝的激进派士大夫规划新朝廷体制时，曾积极主张与明朝建立事大^①外交关系。他们在建构理学之邦的过程中，以往作为新思想理念的宋儒学渐渐晋升为官学的位置。在此过程中，又受到明初官学的影响，其影响最明显的痕迹莫过于明永乐年间编修的“三部大全”传入朝鲜半岛。综合历史脉络来看，后来韩国学者因想突出理学的官方学术特征，称其为“性理学”的情况比“程朱学”和“朱子学”频繁。朝鲜理学家归根结底最初以什么渠道得到“三部大全”？在《明史》和《朝鲜王朝实录》中，可见明朝“三部大全”传播及接受的记载：

皇帝待祔甚厚，命礼部照依世子祔朝见时例接待。一日，诏祔升殿上，帝降御座，临立祔所跪处，一手脱帽，一手摩髻曰：“汝父汝兄皆王，汝居无忧之地，平居不可无所用心。业学乎？业射乎？宜自敬慎读书。”特赐御制序新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及黄金一百两、白银五百两、色缎罗彩绢各五十匹、生绢五百匹、马十二匹、羊五百头以宠异之。《朝鲜世宗1年12月7日丁丑第三纪事》^②

四年赉赐书：“珍禽异兽，非朕所贵，其勿献。”后又敕赉：“金玉之器，非尔国所产，宜止之，土物效诚而已。”八年，赉奏遣子弟诣太学或辽东学，帝不许，赐《五经》、《四书》、《性理》、《通鉴纲目》诸书。《明史·外国一》^③

我国家钦受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详悉精微，诚为东方之宝。因此乃知朝廷新撰诸史诸书，亦必多有。”仪答曰：“太宗皇帝命集儒臣，博采古今诸史诸书，撰述

① 本外交政策鉴于《孟子·梁惠王下》：“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原文参见【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5页。《司马法·仁本第一》：“比小事大，以和诸侯”，原文参见王震：《司马法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页。“事大”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以下实录记载原文中可看出朝鲜王朝事大外交的起点，《朝鲜王朝实录·太祖实录·卷三》（明朝洪武26年，1393年）：“箋曰：‘圣人启统，奄临箕子之旧封；帝命用休，申赐朝鲜之美号。光荣宗社，喜溢臣民。’”《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第五册》：“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乙酉，高丽权知国事李成桂欲更其国号，遣使来请命。上曰：‘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原文参见刘菁华、许清玉、胡显慧：《明实录朝鲜资料辑录》，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30页。

②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六》（明永乐17年，1419年）。

③ 【清】张廷玉等著：《明史·卷三百二十·列传第二百八》，原文参见《明史》（二十八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265页。

成书，名之曰《永乐大典》。假如天字则聚古今所训天字之义，地字则聚古今所训地字之义，至于诸字之义，莫不皆然。天下事物之理，都在《大典》。《朝鲜世宗 17 年 12 月 13 日庚戌第五纪事》^①

朝鲜世宗(1397-1450)即位不久，朝鲜太宗的庶子敬宁君李祹(1402-1458)以谢恩使身份与郑易(? -1425)、洪汝方(? -1438)等文人一起出使明朝。在明朝的有一天，明成祖款待李祹，亲自馈赠附明成祖序文的《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李祹出使明朝前两年(1417 年)，明成祖已下命颁“三部大全”于六部、天下郡县学。由是可知，李祹出使明朝的时候，“三部大全”在明朝内早已普及。值得关注的是，《朝鲜王朝实录》的史官用了“新修”一词。通过“新修”一词可推测，朝鲜朝廷及其关注明朝理学典籍的成书情况。此事在《朝鲜王朝实录》中第一个关于明皇帝亲自馈赠“三部大全”的记载。从理学典籍的传播和接受史来看，明成祖亲自馈赠“三部大全”之事，与以往下赐理学典籍有很大不同，即“第一个明朝编撰的典籍”。

李祹从明朝带回“三部大全”之事外，朝鲜世宗八年(1426)明宣宗(1426-1435)的敕书中，提及馈赠“三部大全”。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该时期明朝馈赠的“三部大全”、《宋史》等书籍是明宣宗按照朝鲜世宗的请求所赠予的。^②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这七年间明朝有两次馈赠“三部大全”。明宣宗馈赠“三部大全”不久，检讨官楔循(? -1435)曾在经筵中评价《性理大全》说：“臣见皇帝所赐《性理大全》，其文似仿于真西山《甲集》，议论精通，众说该备，诚学者所当熟玩也。愿刊行广施，使登科年少之儒习读，研究理学。且为文章者，必精于理学，乃能大达。”^③在楔循看来，《性理大全》类似于一部仿照南宋理学家真德秀(1178-1235)著文风格编撰的理学书籍。由是可知，“三部大全”的传入，使朝鲜朝廷更加关注明朝理学。因此，朝鲜世宗决心向明朝请求恢复留学制度。彼时明朝因全面实行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除了两国之间官方事宜外（如皇帝诰命之事、朝贡之事），其余事务皆不允许非官方人士随意入境。朝鲜只能通过朝天使或与出使朝鲜的明朝文人交流，才能获悉明代当时文化情况。朝鲜太宗在位期间以明皇帝下赐或朝鲜方求赐两种方式，得到明代官方程朱理学典籍。朝鲜世宗曾上奏明皇帝求朝鲜王族子弟入明朝本土内或当时处于两国边境的辽东地区留学，明宣宗对入明朝境内求学不予允许，但同意以馈赠理学典籍为变换方式让朝鲜一方体会明

①《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七十》（明宣德 10 年，1435 年）。

②“谢恩使”指为了感谢明朝皇室对官生的细心栽培，到明朝京师谢恩的使臣。《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三十四》（明宣德 1 年，朝鲜世宗 8 年 11 月 24 日己丑第一纪事，1426 年）：“其敕曰：敕朝鲜国王。今赐王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一部共一百二十册、《通鉴纲目》一部计十四册，至可领也……初尹凤之回也，上请大全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宋史》等书籍，时遇之还，帝特赐之。”其记载亦可见于《明宣宗实录·卷二二·第十册》：“宣德元年（1426 年）冬十月辛未，遣使以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通鉴纲目》赐朝鲜国王李祹。”原文参见《明实录朝鲜资料辑录》，第 64 页。

③《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三十四》（明宣德 1 年，朝鲜世宗 8 年 12 月 8 日丁卯第五纪事，1426 年）。

代当时儒术。明朝拒绝朝鲜王族子弟在明朝留学之后，“三部大全”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使朝鲜朝廷内儒学家们更加关注明朝当下儒术趋势。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朝鲜世宗阅览“三部大全”后，命刊行印刷“三部大全”，颁于全国各地教育机构。由是可知，“三部大全”传入朝鲜半岛不久成为朝鲜官方理学思想的标准。^①

从朝鲜引进明代儒学典籍到被应用到朝鲜的教育机构，明代儒学文化开始与朝鲜本土文化实现交流与融合并在这过程中，儒学逐渐在朝鲜半岛本土化，民族化。朝鲜世宗下命刊印“三部大全”的意图并非仅限于巩固朝廷官学，也在于将理学文化普及到民间。1432年，朝鲜世宗想要编撰强化儒家伦理的教化类书册，辑录110名中国和朝鲜的忠臣、孝子、烈女故事。因朝鲜世宗考虑到大部分朝鲜百姓不识汉字，就采用插画方式做成画册，命名为《三纲行实图》。从《三纲行实图》的成书结构来看，可视为理学文化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典型例子。朝鲜世宗因考虑到以画册教化百姓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他下决心创造新的文字系统。1446年，朝鲜世宗正式颁布使用韩文。^②韩文的发明，使“三部大全”以及其他理学典籍的传播更具进一步本土化和民族化。

三、“三部大全”传入后的反响

“三部大全”传入朝鲜半岛前，元朝理学家胡炳文(1250-1333)编撰的著作《四书通》、倪士毅(生卒不详)辑释作《四书辑释》在朝鲜半岛流通，但朝鲜本土内引进的注解理学经典的书籍甚少。“三部大全”传入后，朝鲜世宗下命普及“三部大全”，朝鲜前期儒学家卞季良(1369-1430)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跋》为题作“三部大全”刊印本的序跋。卞季良在下文中较为详细描述明朝下赐“三部大全”，传入朝鲜本土内情形道：

五经四书若《性理大全》，皇明太宗文皇帝命儒臣编辑之书也。帝以我殿下之好学，出于至诚，特赐是书。书总二百二十九卷，我殿下思广其传。命庆尚道监司臣崔府，全罗道监司臣沈道源，江原道监司臣赵从生。锓梓于其道。臣窃惟吾东方文籍鲜少，学者病其未能尽博。大宋以来，诸儒之说辅翼经书者凡一百二十人，而皆具此书，一览了然。今此刊行，岂非吾东方学者之幸也耶？而我主上殿下钦崇帝赉，缉熙圣学之诚心，广惠

①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七十》（明宣德10年，朝鲜世宗17年10月25日癸亥纪事，1435年）：“《性理大全》及《四书五经大全》，中朝诸儒承命撰述之书，采辑先儒诸说而折衷之，实理学之渊源，学者当先讲究者也。太宗皇帝赐与以后，已曾板刊，置于铸字所。向者印颁臣僚，期于广布，但外方各官乡校与穷村僻巷，曾无一本之藏，乡邑有志之士，虽欲考阅，无由得见，诚为可虑。今同封各册卷数，晓谕各官，如有不干民力，无弊自备，欲印置于乡校者，暨邑人如有能办自愿印之者，收其纸以送，则皆许印送。如或不愿，不必强使为之，其自愿者，亦不必一时尽印诸书，虽一经一书，随其所备纸数，收纳上送。”

② 于1443年朝鲜世宗创造韩文体系，1446年颁布《训民正音》，正式使用韩文。《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零二》（明正统8年，朝鲜世宗25年12月30日庚戌第二纪事，1443年）：“是月，上亲制谚文二十八字，其字仿古篆，分为初中终声，合之然后乃成字，凡干文字及本国俚语，皆可得而书，字虽简要，转换无穷，是谓《训民正音》。”同实录·卷一百十三（明正统11年，朝鲜世宗28年9月29日甲午第四纪事）：“是月，《训民正音》成。”

后学，以淑人心之德教。呜呼至哉。^①

据上面序跋内容，“三部大全”自明朝传入朝鲜本土内不久，朝鲜世宗下命庆尚、全罗、江源等地方官在当地进行全面刊印“三部大全”工作。不可不提的是，卞季良在跋文中高度评价“三部大全”包罗宋代以来学者的注解，一目了然。除了刊印并颁外，朝鲜还开展了“三部大全”的谚解工作。1443年，朝鲜世宗发明韩文。1448年，朝鲜世宗下命集贤殿学士金钩(?-1462)作《四书大全》的谚解本。^②1458年，朝鲜世祖(1455-1468)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于郑麟趾(1396-1478)、申淑舟(1417-1475)等朝廷文臣，下命开始进行该两本大全的谚解工作。^③据朝鲜学者安鼎福(1712-1791)著《橡轩随笔》记载，《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谚解工作始于柳崇祖(1452-1512)，至朝鲜宣祖(1552-1608)时期设立校正厅不久后完成。^④与此同时，参加谚解的理学家深受“三部大全”注疏方式的影响，有些朝鲜学者做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的注解，如李滉(1501-1570)《经学释义》、李珥(1536-1584)《四书释义》、李德弘(1541-1596)《四书质疑》、金长生(1548-1631)《经书辨义》等著作。

有趣的是，与《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不同，朝鲜学者以“节要”方式注解《性理大全》。在《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中，最早提及国王下命注解《性理大全》是朝鲜成宗时期(1469-1494)。^⑤朝鲜中宗(1506-1544)时期学者金正国(1485-1541)曾主持刊行《性理大全书节要》，其兄金安国(1478-1543)在《性理大全节要》题跋中，说：“若四书五经史鉴集选等书，崇学既众，刊行既多者，容或易购，而本道亦多版本，欲览读者有不难致。至于性理大全一书，乃理学之源本，经书之羽翼，士苟志于古，不徒以记诵词章为务。”^⑥在题跋中可看出，金安国高度评价《性理大全》。颇为有趣的是，朝鲜中宗时期的理学徒分两派：一个是强调基于理学典籍本身的“道学派”、另一个是鼓励作文的“词章派”。金正国深受道学派代表人物金宏弼(1454-1504)的影响，他也强烈批判词章学，所以编纂时彻底删除了《性理大全》诗文的部分。后来朝鲜明宗(1545-1567)时期的

①【朝鲜】卞季良：《春亭集宣祖乙酉以后，设校正厅，集经术之士，论定谚吐，累岁而成。卷十二》，原文参见《국역춘정집》(二册)，서울:민족문화추진회，2001年，第89-90页。

② 谚解(언해)是指将汉文翻译成谚文，这里“谚文”指的是“韩文”。《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九》(明正统13年，朝鲜世宗30年3月28日己丑第二纪事，1448年)：“钩为尚州未半年，时集贤殿奉教以谚文译四书。”

③【朝鲜】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经史篇一·经典类·经传杂说》：“我世祖三年戊寅……命郑麟趾、申叔舟、丘从直、金礼蒙、崔恒、徐居正等。分授五经四书。考古证今。定口诀以进。此今之经书句读悬口诀。而谚解亦口诀之所解释者也。”

④【朝鲜】安鼎福：《顺庵集·卷十三·杂著·橡轩随笔(下)》：“经书谚解。始于柳参议崇祖。柳眉庵日记言之矣。盖东俗言语与中国异。故其文义训解。必以方言释之。然后可以教习矣……宣祖乙酉以后，设校正厅，集经术之士，论定谚吐，累岁而成。”

⑤《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五》(明弘治2年，朝鲜成宗20年3月9日丁卯第四纪事，1489年)：“传于弘文馆曰：“《性理大全》必参考诸书然后，乃通其意，诸书浩繁，披阅为难。可于卷端，考诸书书之。”

⑥【朝鲜】金安国：《慕斋集·卷十二》。

理学家李楨(1512-1571)编纂《性理遗编》时,参考《性理群书》《性理大全》之后,收录了《性理大全书节要》删除的诗文部分。^①与金正国同时期的理学家周世鹏(1495-1554)在木刻版《性理大全书节要》的跋文中说:“是书既刊。行于内外。而简帙汗漫。贫士愿见而不得者尚多。虽得之而会其要领者亦鲜矣。闻韶思斋金相公正国。乃撮其宗的。总若干篇。名之曰性理节要。”周世鹏认为,金正国因为考虑到《性理大全》共70卷,篇幅浩大,而且解释难度很高,所以措《性理大全》之要,编《性理大全书节要》。《性理大全书节要》共4卷4册组成:卷一选取《性理大全》卷1-25宋儒著述的部分内容,其他卷概括了《性理大全》卷26-69里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性理大全书节要》未收录《性理大全》“理气”和“易”的部分。从时代背景能推断删除其线索:一、金正国之后,以李滉、李珥为代表的理学家开始探讨“理气”,当时朝鲜理学还在沉浸于学习明朝理学历典状态。与李滉、李珥同时期的学者朴承任(1517-1586)著《性理类选》,该书成书结构与《性理大全书》与《性理遗编》一样,朴承任选取《性理大全》的核心内容。^②有趣的是,《性理遗编》收录了《性理大全》卷26~38里的理气、鬼神、圣贤、性理部分。《性理大全》收录北宋学者邵雍(1012-1077)的《皇极经世书》。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朝鲜成宗时期文臣李克培(1422-1495)与姜希孟(1424-1483)在经筵中启禀国王,提及《性理大全》收录的《皇极经世书》,其奥意并非所有人能理解的,因此择弘文馆官员预习其书。^③后来,与金正国同时期的文臣崔世珍(1468-1542)说:“若不参阅辑注书(《实录》中的“《皇极经世书集览》”),就不能理解《性理大全》收录的《皇极经世书》。”9年后,崔世珍出使明朝归国,向中宗进献尚未传入朝鲜的元末明初学者朱隐老(?-1357)所作《皇极经世书说》12卷,并请求刊行《皇极经世书》。^④3年后,金正国同样请求刊行《皇极经世书》,说该书不但有助于阅览邵雍的文章,而且有助于讲读《易经》。^⑤由《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可推测,崔世珍及金正国等朝鲜前

①【朝鲜】李楨:《龟岩集·卷一·性理遗编补录跋》:“尝读性理群书及大全书。窃有拳拳欲学之心。而鲁莽钝劣。苦无记性。谨拈出两书中赞、铭、箴、诗、序、记、文、说、赋、论、行实诸篇。汇为一帙。”

②【朝鲜】朴承任:《俛宇集·卷一百三十五·序》:“此永乐皇帝所以申命儒臣,哀粹会通,编成大全,以嘉惠乎天下者也。于乎其有得于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矣乎!声教东渐,文化兴隆……及年四十九岁。乃就性理大全中提其肫膈,撮其精粹,因类立目,别为部帙,以便随身之装而供朝夕之省览。”

③《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二》(明成化16年,朝鲜成宗11年10月20日丙寅第二纪事,1480年):“御经筵。讲论,领事李克培、知事姜希孟启曰:‘《性理大全》,有《皇极经世书》、《律吕新书》,其奥义微旨,非人人所能解也,请择弘文馆员之英敏者,预习进讲。’”

④笔者注:北宋儒邵雍暨元末明初儒朱隐老皆有同名著作《皇极经世书》,别名《皇极经世书说》。朱氏的该著是对邵氏《皇极经世书》进行诠释。从时代背景考虑,《朝鲜王朝实录》提朱隐老著作时,多加了一个“说”字。《皇极经世书集览》,疑由《皇极经世书》衍生而成的辑注本,如蔡元定《皇极经世指要》、张行成《皇极经世索隐》、祝泌《皇极经世解起数诀》、黄畿《皇极经世书传》等。《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七十》(明嘉靖9年,朝鲜中宗25年12月20日丙子第二纪事,1530年):“僉知中樞府事崔世珍,以《皇极经世书集览》,进上曰:

‘《皇极经世书》,附《性理大全》,而学者病不能尽解其意,必因集览后,可得尽解矣。’”同实录·卷九十(明嘉靖18年,朝鲜中宗34年5月17日甲申第一纪事,1539年):“崔世珍以《大儒大奏议》、《皇极经世书说》十二卷进献曰:“《大儒大奏议》,虽皆古文,然新撰哀集,宜人君所当观鉴。《皇极经世书说》,亦我国所无,敢献,请印行,使人人皆得见之。”

⑤同实录·卷七十(明嘉靖21年,朝鲜中宗37年5月7日丁亥第一纪事,1542年):“礼曹判书金安国书启可印书册曰:‘《皇极经世书说》,乃皇朝朱隐老所著,发明邵书,考究有据,议论亦畅,实邵书之羽翼。《易经集

期文臣并非不熟悉《周易》经典本身，而是对中国历代诸家对《周易》的注解不了解。

朝鲜理学家通过谚解以及整理《三部大全》，后来达到提出注解的疑误处。朝鲜朝鲜宣祖时期理学家与柳希春(1513-1577)在他12月10日到1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校订注释的经历：“初十日。校正论语释疏第一册。十三日。庆尚都事金千谥士重书来。性理群书疑误处。亦写来。十四日。郑舍人澈问《小学记》疑难处。余即一一答之。且请念后来此。商确《论语释疏》云：余与宋君庭笋同议《论语释疏》，宋君以为释“关雎乐而不淫乐”，不若云“乐”，余即从之。”^①柳希春在日记中未详述与金千谥(1537-1593)、郑澈(1536-1594)讨论哪家的《性理群书》《小学记》注解方面存疑，可是简述了与宋庭笋(?-?)讨论《论语释疏》里《论语·八佾》里“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问题。与柳希春同时期的理学家奇大升(1527-1572)在经筵中批判“三部大全”说：“永乐皇帝命撰集《四书》《五经》及《性理大全》，则不知朱子之意，而撰修处，多有之。《诗》《书》《论语辑注》，与先儒之论，乖戾处，亦多有之。我世宗晚年，不见辑注，凡《四书》，只印大文大注而览之……《论语辑注》，不须见之。一度览遍之后，即以大文大注册见之为当矣。”^②奇大圣在经筵中主张“三部大全”的注疏问题有两方面：一、不晓朱子之义而纂修；二、收录的《诗经》《书经》《论语》的辑注与先儒注解有很大差异。虽然奇大圣在经验中未详述何处存以上两问题，但奇大圣引朝鲜世宗晚年只读大注的案例支撑自己理学立场。奇大圣认为，“辑注”当然使读者一目了然，同时使读者眼花缭乱。

总而言之，在朝鲜理学家谚解工作到注解“三部大全”过程中，呈现了朝鲜理学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比如《性理大全书谚解》中有删减诗歌部分、《性理遗编》收录《性理大全》的诗歌部分、《性理类选》收录理气部分等。到16世纪后期的柳希春和奇大圣，发展到不再谈论收录及删减问题，而找出注疏上的疑误处。朝鲜理学家谚解及注解的这段历史表明，朝鲜王朝逐渐建构理学之邦。

结语

朝鲜中宗时期代表理学家赵光祖(1482-1520)在《事实》一文中评价朝鲜世宗时期的理学道：“高丽时，虽为学问，只主词华。至丽末禹倬、郑梦周后，始知有性理之学。及至我世宗朝，礼乐文物焕然一新。”^③按原文里提到的“礼乐文物焕然一新”，可知朝鲜世宗在位时期的确深受明永乐年间编修的理学典籍的影响。与其他时期不同，朝鲜

说》，所载诸公，论议明畅，多所发明义旨，讲读《易经》之际，参考乎此，则不无资益。’”

① 笔者注：《论语释疏》，疑梁朝黄侃《论语义疏》。【朝鲜】柳希春：《眉岩集·卷十四·日记》。

② 笔者注：《论语辑注》，疑元朝倪士毅《论语辑释》。《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卷三》（明隆庆3年，朝鲜宣祖2年4月19日壬辰第一纪事，1569年）。

③ 【朝鲜】赵光祖：《静菴集·附录卷之一》。亦收录于【朝鲜】奇大升：《高峰集·论思录卷之下·初七日》、李裕元：《林下笔记·卷之八·人日编》。

世宗时期直接全面吸收中国理学，同时，开始形成朝鲜本土化的理学思想。朝鲜世宗时期起，将最初仅限于掌管学问研究的机关“集贤殿”职权范围逐步扩展，以至于接近中国的翰林院。随着集贤殿职权范围的扩大，刊印事业也进展顺利。这无疑是受到明永乐年间编纂的“三部大全”和参与编纂“三部大全”的人员背景的影响。

明朝“三部大全”的传入，奠定了朝鲜前期对理学认识的基础。朝鲜正祖(1776-1800)在《十三经抄启文臣课试》中评价道：“一自皇明永乐中，颁四书五经于学宫之后，免园之儒，下帷之生，童而习之，白首纷如者，要不离乎胡广、解缙之大全。”^①朝鲜正祖时期的丁若镛(1762-1836)有类似的评价：“及夫大明御世，文明迈越，则又尊信朱子，禁止异说，四书、三经，班之学宫，胡广、解缙撰次《大全》，使天下学者，皆得以弃智绝意，一其趋尚。”^②他们评价表明明永乐年间编修的理学典籍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16世纪初，未经过中朝两国官方传播流程的王守仁(1472-1529)《传习录》在朝鲜传播，朝鲜官学仍固守程朱理学，强烈排斥陆王学，甚至强烈批判明朝内流行陆王思想。当时参与“三部大全”谚解工作的李滉、李珥、李德弘等一批朝鲜理学家批判陆王学。与此同时，陈献章(1428-1500)《白沙子全集》、薛瑄(1389-1464)《读书录》、程敏政(1446-1499)《道一编》、罗钦顺(1465-1547)《困知记》、陈建(1497-1567)《学蔀通辨》等大量明朝理学家著作传入朝鲜半岛。16世纪前中期的朝鲜理学家接触这些书籍后，朝鲜理学家之间便产生了以“人心道心”和“理气”为题的学术论争。笔者认为，朝鲜理学家强烈批判陆王学和朝鲜学者之间的“人心道心”和“理气”论辩，都是理解并阐释“三部大全”过程中形成的现象。16世纪末壬辰倭乱之后，以许筠(1569-1618)、郑齐斗(1649-1736)为代表的朝鲜理学家涉猎陆王学，但他们仍不肯否定“三部大全”在官学的地位。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变化，官学以外思想方面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学的影响力有所变化，可是“三部大全”的影响一直伴随着朝鲜官学思想。自“三部大全”传入朝鲜半岛到朝鲜王朝灭亡(1910)，“三部大全”在朝鲜王朝理学史上仍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①【朝鲜】正祖：《弘斋全书·卷五十·策問三》。

②【朝鲜】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诗文集第八卷·十三经策》。